

马克思“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论断的溯源与释义

寇东亮

【摘 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思想谱系中,存在一种“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这一逻辑内蕴一种对劳动的偏见和蔑视。洛克、斯密、黑格尔等确立劳动作为市民社会以及人之生成的建构性原则的地位和意义,但劳动总体上被归结为“谋生手段”,因而在根本上并未突破“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马克思超越“实践—劳动”二元论传统,通过融通劳动概念与实践概念,阐明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内涵、本质和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就其基本内涵和本质规定而言,是以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活动;就其价值立场和承载主体而言,是基于消灭劳动剥削的“人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活动;就其历史延展和实现条件而言,是在人类社会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活动。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实践;生活第一需要;自由

【作者简介】寇东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伦理学研究》(长沙),2022.1.1~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观建构中的思想资源及其创新整合研究”(17AKS009)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形态大致会经历一个从自然劳动(原始公共劳动)到奴役劳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雇佣劳动)最终走向自由劳动的历史演进,自由劳动是人类劳动的最高形态。马克思视域中终极意义的自由劳动,即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交换被超越了,人的劳动不再表现为劳动产品所具有的“物”的属性,而是作为工作与消费的统一来发挥作用。那时,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435)]。马克思“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论断,既传承了西方劳动观念史的积极思想成果,又建构了劳动观念的革命性的科学创见。

—

在词源学意义上,“‘劳动’(Arbeit)一词源自古老

的印度日尔曼语,主要表示体力活动的辛劳、痛苦、艰难、累赘等特征。在中古高地德语中,劳动从来也没有与创作活动相提并论,劳动仅仅表示辛劳。在创造了机器一词的斯拉夫语中,劳动同样意味着奴役和劳役。在拉丁语中,劳动(labor)也是指体力劳动;描绘的是一副人在重负之下趑趄而行的图像。法语的劳动(travail)一词具有同样的背景:它与栅栏一词有关,是指用来围栏牛马的器械。因此,从劳动一词的这种词源来看,从事劳动会使人感到疲惫、感到劳累”^[2](8)]。

劳动概念在古希腊的原初语义是,用身体工作。古希腊时代对劳动的轻视或蔑视,不是因为劳动是由奴隶承担的,而是因为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所有服务于生存需要的职业都具有奴役本性,劳动意味着被生存必然性所奴役。所以,奴隶制“并不是

一种利用廉价劳动的手段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一种把劳动排除出人类生活境况的尝试”^{[3](62)}。劳动是迫于生命必然性的维生性活动,是一种私人性的家奴活动。在中世纪,“‘劳动’这个词,在那个年代甚至还没有出现。古代晚期闻名的三脚支架,是一个有三只脚的设备,当时人们用它来拴马和钉马蹄铁,后来它成为拷问架,而它的语义逐渐演变为‘劳动’的意思。显然,从12世纪起,劳动是指非常辛苦的活,一直到16世纪,含义才有所变化”^{4}。在基督教世界,劳动观念经历了一个“从圣经和早期中世纪作为赎罪的劳动,向被恢复了名誉的劳动,到最终成为救赎手段的劳动的演变”^{[5](8)}。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提供了一种“劳动神学”。“人应当按照上帝那样来劳作。而上帝的劳作,便是创世。故而任何不进行创造的职业都是恶劣的或者低等的。必须像农民一样创造丰收,或者至少像手艺人那样将原材料转变成物品。在不能创造的情况下,必须进行转变、修改、改善。因此不创造任何东西的商人受到谴责。”^{[5](114)}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谋求救赎的教徒来说,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在4至12世纪之间,基督教的这种“劳动神学”一直处于隐含、潜在的状态,只是作为一种未充分发展甚至被泯灭的可能性,在那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沉思生活,仍被视为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9—12世纪,在教士(祈祷者)、武士(作战者)、劳动者的社会三等级图式中,劳动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确认。这里的“劳动者”在那个时期有着更为有限和更加明确的意义,专门指称农业劳动者中那些缔造农业新技术和推动农业进步并从中受益的人,是一个经济上的精英阶层,处于基督教世界农业飞跃的领导地位。社会三等级图式表达了社会的一种神圣的升华的形象,它并不包含全部社会阶层,而只是包含了那些配得上表达社会根本价值即宗教价值、军事价值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新兴的经济价值的阶层^{[5](93-97)}。11—13世纪,随着商业的觉醒、现代城市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细化,一些新的社会活动和新的“劳动者”阶层出现了,如手工匠人、商人、技术人员等。“这些阶层在物质层面上很快立住脚,他们想战胜对于劳动的偏见,劳动是他们职业的本质,是他们

地位的基础。”^{[5](124)}

洛克最早回应新“劳动者”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确认劳动在世俗世界的创世意义和神圣地位,并立足劳动论证私有财产权的起源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洛克那里,劳动似乎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洛克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的基础是劳动,人们根据劳动来享受劳动的成果。“上帝将世界给予全人类所共有时,也命令人们要从事劳动,而人的贫乏处境也需要他从事劳动。上帝和人的理性指示他垦殖土地,这就是说,为了生活需要而改良土地,从而把属于他的东西、即劳动施加于土地之上。谁服从了上帝的命令对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开拓、耕耘和播种,他就上面增加了属于他所有的某种东西,这种所有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如果加以夺取,就不能不造成损害。”^{[6](22)}在洛克看来,劳动是财产权的根据。对于一个人来说,“上帝命令他而他的需要亦迫使他不得不从事劳动。那是他的财产,人们不能在他已经划定的地方把财产夺走。因此,开拓或耕种土地是同占有土地结合在一起的。前者给予后者以产权的根据。所以,上帝命令人开拓土地,从而给人在这种范围内将土地拨归私用的权力。而人类生活的条件既需要劳动和从事劳动的资料,就必然地导致私人占有”^{[6](23)}。因此,“只要有人愿意对于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给与财产权”^{[6](29)}。洛克所说的“劳动”,是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自由劳动。洛克侧重劳动之于人(劳动者)的生命和自由的意义,他建构了一种“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劳动意识形态。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从财富增长和交换价值的角度理解劳动。在重农主义那里,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只有农业能够创造纯产品。“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是,农业同时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7](180-181)}斯密超越了重农主义关于劳动的特殊规定性,认为

“劳动一般”创造财富。“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18](26)}斯密这里所说的“辛苦和麻烦”,指称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马克思指出,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9](29)}。劳动概念的理论创构与劳动形态的历史丰富程度是一致的。

二

西方思想史上,在对人的本质及其活动结构的理解中,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许多思想家秉承一种隐形的“实践—劳动”逻辑,这一逻辑内蕴灵魂—肉体、理性—感性、道德—技术、目的—手段、自由—必然、主人—奴隶、精英—群众等二元对峙理念,充斥着一种对劳动的偏见和蔑视。阿伦特指出:“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随着城邦生活越来越要求公民付出更多时间,越来越要求他们放弃所有其他活动而完全投身于政治,最终劳动涵盖了一切需要辛苦付出的活动。”^{[3](61)}古希腊人对劳动的贬低和蔑视,是出于对自由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劳动”逻辑蕴含公民与奴隶、自由与奴役、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古希腊自由概念的核心要义。在古希腊,“自由是以支配奴隶为基础的,没有这种根本的支配关系的自由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因为自由不仅包含对他者的支配,也包含了对于生存来说,驾驭和支配根本上就是必要的”^{[10](37)}。劳动是一种奴役,但它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不同等级和奴隶的身份角度理解劳动,“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是正当的”^{[11](16)}。奴隶的身份决定了奴隶的劳动是一种“卑陋”的活

动。“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作者,都属‘卑陋’;所以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佣、赚取金钱、劳悴并堕坏意志的活计,我们就称为‘卑陋的’行当。”^{[1](41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因其从事的活动受到生存必要性的制约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只有摆脱了谋生性活动而参与和处理共同体共同事务活动(实践)与能够进行理性沉思(思辨)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即自由人。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劳动”逻辑是一种精英主义观念,是一种维护等级、不平等、剥削等的意识形态说辞。

近代以来,人们对劳动的重视、推崇和赞美,更多出于物质生活与创造财富的经济考虑。古典经济学家把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和内在本质,凸显了财富的主体特质,但他们把劳动(包括劳动者)仅仅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是生产的“要素”和“资源”,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因而,在斯密看来,劳动与自由、幸福是对立的。斯密把在劳动之外的安逸看作自由和幸福,而把劳动看作安逸、自由和幸福的牺牲。“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8](28-29)}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7](124)}

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概念与实践概念开始交集和融通,劳动不仅被视为建构市民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被提升为一种人的精神本质的生成和自我确证的活动。黑格尔提出和建构了一种哲学意义的劳动观^{[12](260-268)}。在一部未发表的著作草稿《人伦的体系》(1802-1803)中,黑格尔全面吸收了斯图亚特的国民经济学思想,对需要、劳动、享受、占有、生产、所有、工具、分工、商业、价值、货币等一系列经济范畴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试图将这些范畴改造成哲学范畴,纳入其哲学体系。黑格尔充分认识到,劳动是近代社会的构成性原理,他将劳动设定为构建“人伦的体系”的起点。在《精神哲学草稿I》(1803-1804)中,黑格尔援引斯密《国富论》中的相关思想,揭示劳

动对个人与共同体所起的推动作用。“人的劳动是形式的、抽象的普遍的劳动,也是个别的劳动。他只从事满足自己需要之一的劳动,他的需要由通过交换而来的必需品来满足。他的劳动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普遍的需要,即作为一个普遍的需要的抽象态。他的整个需要由一切人的劳动来满足。在个体的需要范围和他为满足需要的活动之间,钻进来了整个民族的劳动。从内容上来看,每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的、普遍的劳动,也是满足每个人的一切需要的普遍的劳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劳动都具有价值。他的劳动、他的占有物,并不是为了他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一切人所存在的。”^[12](266-267)]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对自我意识的分析中,通过主—奴辩证法,强调劳动是陶冶事物的一种否定性行动,是“主奴关系”得以转化的活动。在对“物”的加工改造即劳动中,从奴隶方面看,“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奴隶据以陶冶事物的形式由于是客观地被建立起来的,因而对他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即是他自身;因为这形式正是他的纯粹的自为存在,不过这个自为存在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实现。因此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己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13](131)]。相反,从主人方面来看,由于主人把奴隶置于他与物之间,就等于把自己对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了奴隶,因而主人“所完成的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反而是一个非独立的意识”^[13](129)]。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手段性与目的性双重意义。一方面,劳动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谋生性意义。在市民社会的“需要的体系”中,“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14](203)]。另一方面,与理论教育不同,劳动是一种实践教育,具有塑造人的目的论意义:“通过劳动的实践教育首先在于使做事的需要和一般的勤劳习惯自然地产生;其次,在于限

制人的活动,即一方面使其活动适应物质的性质,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使能适应别人的任性;最后,在于通过这种训练而产生客观活动的习惯和普遍有效的技能的习惯。”^[14](34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黑格尔关于劳动的人类学意义的思想,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7](205)]。但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劳动观念存在两个缺陷。一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黑格尔仅仅抽象地论及劳动对于奴隶意识转化为“自为存在的意识”的可能性的积极作用,而没有看到奴隶的劳动不仅仅是单纯改造加工“物”的过程,而且这一改造过程是在主人的控制并为主人服务的,因而黑格尔没有意识到基于私有制的劳动所产生的物对“奴隶”(工人)的压迫和统治。二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黑格尔把自我意识视为人的本质,他所谓的劳动,根本上是自我意识异化而又克服异化的精神活动,是思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总体而言,劳动辩证法在黑格尔早期哲学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在黑格尔后期思想中,劳动概念被边缘化了,“劳动的辩证法失去了它的中心意义”^[15](31)]。

三

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始终有些混乱。劳动既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又是最人性和的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可是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任务却不是解放劳动者阶级,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因为‘只有在被需求和外在效用所决定的劳动状态终结之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那里,‘直接肉体需要的统治’就终止了……在他作品的所有阶段,他都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需的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3](75-76)]显然,阿伦特是在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实践—劳动”二元论逻辑的意义上理解马克

思的劳动概念的。事实上,马克思超越了西方传统“实践—劳动”二元对峙传统,通过融通劳动概念与实践概念,立足唯物史观,深刻阐明了劳动的本质和意义,建构了科学的劳动观。其中,关于“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论断,是这一科学劳动观的核心要义之一。

就其根本内涵和本质规定而言,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以人的能力本身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活动。从理论逻辑的变革意义来看,马克思一方面把传统劳动观念提升到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的实践意义层面,使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基于外在必然性的工具性活动,而是成为一种人的自为性的目的性活动;另一方面也使亚里士多德—康德主义的实践概念不再仅仅停留于作为政治和伦理活动的人的“观念”的实现层面,而是获得一种感性的、物质的、生产性的规定,成为一种“直接现实性”的社会活动。通过实现劳动的实践化与实践的劳动化的有机统一^[16](100-104)],马克思揭示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深意。在《巴黎手稿》中,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感性对象性原则和黑格尔劳动辩证法思想,提出了一种感性对象性活动意义的、作为“富有的人”的实现活动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把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人称为“富有的人”。所谓“富有的人”,“就是需要有人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7](194)]。而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富有的人”自我实现的第一需要和根本需要。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从自由自觉的劳动与“直接谋生的劳动”的区别中,初步阐述了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的内涵,强调劳动既是人的直接的生活来源,更是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是个人生活的积极实现和自我享受。“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7](184)]这是一种“自愿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人能够“肯定自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感到幸福”,“感到自在”,“觉得舒畅”^[7](159)]。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规定为“现实的、感性的活动”^[7](499)],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7](500)],强调“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50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需要”“第一个历史活动”等高度,确证物质生产的人类学地位和意义,并基于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阐明了“生活的生产”的本质及其目的论意义。在与“强制活动”的区别中,马克思揭示了蕴含于“生活的生产”中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自主活动”图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强制活动中,“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8](30)]。与强制活动不同,“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8](76)]。在自主活动中,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8](30)]。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劳动—资本”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自主活动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区别中,深刻阐述了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的本质及其愿景。当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9](174)]。这种劳动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19](929)]。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愿望,最大化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潜力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在这种劳动中,“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9](137)]。通过这种劳动的“绝对运动”,实现以人的自由自觉(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为基础的意志自由与以人的对象化活动(主体的对象化)为基础的客观自由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自然必然性)、人与人(社会必然性)和人与自我(内在必然性)之间关系的有机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9](929)]。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与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区别中,马克思把

“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视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的根本特质之一,并把这种劳动的具体内容概括为“各尽其能”^{[1](436)}。

就其价值立场和承载主体而言,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基于消灭劳动剥削的“人人都必须”承担的社会活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18](28)}。于是,“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18](95)}。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等谋生性劳动中,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劳动作为谋生性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生活的唯一需要,使自己完全成为劳动的动物。生产资料占有者则依靠攫取他人的劳动而生存,成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所以,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8](67)}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主要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所谓“消灭劳动”,本质是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11](158)}。这种劳动解放意味着,“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0](310-311)}。于是,“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7](710)}。

就其历史延展和实现条件而言,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在人类社会辩证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196)}。马克思在自然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和自由必然性三个维度,从“物质变换”“谋生手段”“生活的第一需要”三者的统一中理解劳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物质变换”和“谋生

手段”的劳动,是一种基于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必然王国/偶然王国”的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一种基于自由必然性的“自由王国”的劳动^[21]。马克思认为,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9](929)}。必然王国即“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19](928)}王国。“必要性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即作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自然必然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即作为特定历史规定的劳动,如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等。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植根并生成于作为“物质变换”和“谋生手段”的劳动。所以,马克思强调,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19](174)}。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的历史延展和不断实现,既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需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变革。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9](69)}。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以及基于此所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保证和实现“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的根本条件。马克思说:“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22](113)}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以及旧式分工尤其是脑体劳动分工等的消除,“物质生产中的必然因素越来越被倒置着去促进自主活动的自由因素”^{[23](360)}。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强劲。在这种发展趋势中,那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由于与生产资料分离而被赋予的“劳动力”价值规定将会消失,进而劳动便不断从被迫的作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向自主的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转换。这是

一个长期的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1920年,在谈到共产主义劳动问题时,列宁一方面高度赞赏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实践萌芽形式,如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他认为,这种劳动“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24] (130)};但另一方面,列宁也告诫当时的苏联人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24] (130)}。

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既是人类劳动辩证发展的一种终极(历史)愿景,更是人类劳动辩证发展的一个实践(现实)环节。我们需要在逻辑与历史、观念与存在、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伦理与实证的统一中,进一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关于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乔治·恩德勒,等.经济伦理学大辞典[M].李兆雄,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3]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4]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劳动史[M].陈青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5]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M].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6]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 [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15]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6]徐长福.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寇东亮.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三个王国”的自由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3]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M].俞可平,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24]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